

屈原人生轨迹的医学考量

☆ 浙江温州 陈德春

屈原，本名正则，字灵均。又名平，字原，后儒尊之为屈子。屈原生卒，众说纷纭。本文拟就其履历，分为任职前、从政期、放逐后3个生活片段，从医学角度考量屈原的人生轨迹。

忠孝两全的爱国情怀

根据屈原自叙以及后人的考证，公元前339年屈原出生在楚国（今湖北省秭归县）。他的始祖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之“苗裔”，与楚王同氏——芈，是楚国王族三大姓（昭、屈、景）之一。因此，对于屈原而言，尽忠亦即是尽孝，爱国亦即是爱族。使屈原走向忠孝两全的人臣之路。

出身于帝胄、贵族之家的屈原，自童蒙伊始，便有了优于常人的心理暗示。其父伯庸屈屈原降生于特殊美好的日子里，气度非凡，乃谨遵卦兆赐之以“嘉名”，希望于屈原能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。是以从小严格施教，及长转益多师，让屈原诣昭府见习、读书、抄写。后来，屈原又得到隐士馈赠以一大袋竹筒，使其知识日益渊博。如他自己所谓：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表明了他对与生俱来的客观“内美”，通过自己的主观“修能”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充满自信。

美国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说：“人类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的产物……外在的社会影响力塑造着我们的态度和行为。”屈原正是在这种先天的、社会的心理自我暗示下，凭借着暗示的强大潜力，自觉修养，臻于完美。基于他的父祖叔伯们都曾在楚国担任要职，可以想见，其儿时的生活是在“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”中度过的。所以，他有条件设计奇服、制作奇服，并长期穿着奇服；他有条件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仪表与言行举止，以示尊贵；他有条件在修文的同时又兼习武艺，而佩剑终生。总之，由于他自幼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在其出任任职之前即已彰显了他是一位文武全才、仪表堂堂的公子王孙。

哲学家和教育家、英国弗朗西斯·培根说：“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，它可以主宰人生。因此，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，去建立一种好的习惯。”这样的说法佐证了两千多年前屈原父子的做法是正确的。同样，戴维·迈尔斯的说法，也印证了屈原当年的做法是合理的。他说：“我们的文化有助于定义我们的情境。我们对机敏、坦诚和着装的标准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。”屈



原的家庭文化背景，敦促了他对道德品质的苛刻要求，助长了他对着装标准的独特爱好，也成全了他的行为习惯和人格趋向。

屈原的生活背景决定了他的生活情境：为了孝，他必须爱族；为了忠，他必须爱国。所以，在他担当社会角色之前，他的人格就已基本定型——他服饰整洁，仪表端庄，步履稳重；事无巨细，循规蹈矩；忠于宗国，憧憬“美政”；敢于改革，责任心强。而且毕生追求精益求精，凡事讲究至善至美。诚如东汉王逸所说，屈原乃“膺忠贞之质，体清洁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，进不隐其谋，退不顾其命，此诚绝世之行、俊彦之英也”。这些足以说明，屈原是一位千真万确、不折不扣的坚持原则、注重道德的完美主义者，这种完美主义者的追求对其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恩怨纠缠的君臣情结

屈原20岁左右出任三闾大夫，翌年晋升为左徒。前者除管理王族谱牒外，具体负责昭、屈、景三姓王室子弟的教育工作，相当于贵族学校的教育长官，着力培养关心民瘼的执政党人。他的施教蓝图是栽培一批批兰心蕙质般的帝胄弟子，正如其在《离骚》中言：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

衡与芳芷。”并殷切地盼望着有所收获——“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。”

遗憾的是，不久屈原即被调进庙堂，担任左徒，与楚怀王亲密相处，成为楚国政治核心仅次于令尹的第三号人物。奉命制定宪令，初见成效以后，遭到了以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竭力反对，这是内政。在外交方面，时值战国七雄纷争，合纵连横，时局变幻。屈原主张联齐抗秦，亦初见成效，同样遭到靳尚之流的忌恨。

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：“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。”屈原被逐以后，犹一再表达了“愿陈情以白行”的思君念国，以及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执著精神和“伏清白以死直”的崇高气节，诠释了屈原自始至终对宗国的不离不弃、对“美政”蓝图的坚定信念。

此时屈原，对楚怀王是感恩中杂糅着几分怨怒的。从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，到后来“数惟荪之多怒兮”“君含怒以待臣兮”“惜壅君之不昭”，忖其措辞，虽怨声逐步升级，但尚不失贞臣节操。

此时屈原，对那些“贪婪”“怨己”“追逐”的狡黠佞人，则敬而远之。唯对楚怀王仍抱一线希冀。到后来，怀王入秦，顷襄王继任，为了美政，屈原

犹抱一丝奢望，孰料令尹子兰，联合顷襄王放逐屈原，令屈原惟恐重遭小人排斥。

其实，起初鼓励屈原改革并商讨制定新法令的楚怀王之所以半途而废，是有人类之劣根性与社会根源的。弗·培根在《人生论·论革新》中指出：“既成的事物，即使并不优良，也会因已被习惯所适应而生存；新事物，即使更优良，也会因不适应于旧的习惯而受到抵制。”他又说：“社会改革难免触犯既得利益……而受损者则必然要诅咒那些改革的发起者。”所以屈原之被孤立是可想而知的。比照之前商鞅、其后王安石、乃至康梁变法，也都无不因此而失败。

历数屈原任职，含二度使齐，首尾不过十年。君之与臣，由重用到疏远，进而被谪，恩怨交加；僚属之间，怀恨者多，同声者少。迨楚顷襄王朝，“又遭子兰算计。”此后屈原，远离政坛。恩怨纠缠的君臣情结正是屈原人生轨迹在医学上的反映。

进退维谷的彭咸情愫

纵览屈原的下半生，因有过风光，为了理想，目睹现实，自难释怀，故昼夜沉浸于苦楚之中。这期间，他也曾有过心理博弈。如：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！”尽管现实是“使谗谀而日得”，他犹不愿看到“使芳草为藜幽”。甚至连其姐质问：“世并举而好朋兮，夫何载独而不予听？”他也无动于衷。虽有“任重石之何益”？但最终还是“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！这坚持，这情境，便是贯穿屈原一生的人格魅力。

这期间，他也曾有过进退维谷，因为“竭忠诚以事君兮，反离群而赘疣”，所以萌发了“退静默而莫余知兮，进号呼又莫吾闻”的感慨。他也曾“欲高飞而远集兮，或欲变节以从俗”，或“恬死亡而不聊”，却都因“志坚而不忍”。屈原，心潮起落！“背膺脾以交痛兮，心郁结而纡轸”屈原，心力交瘁！这犹豫，导致了屈原郁郁寡欢。久而久之，使屈原产生了情感性障碍，产生了完美型人格的侧翼思想——愤世嫉俗。这，在他的作品里，随处可见，最突出的是其作品《天问》提出了170多个悬念。这，只是非精神科的心理行为。所以，其作品被誉为为独步骚坛的中华绝唱！

即便在《天问》篇中，三百七十四句，率皆言有所本、事实可核、义理能明，自始至终蕴藉着屈原对宗国的赤子之心。他将力谏商王无果愤而投水的彭咸视为偶像以后，一次又一次地类似表示——“愿依

彭咸之遗则！”于倾诉衷肠的同时，犹不忘搜集民间歌谣，创作了《九歌》，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喟和爱国情操。即便在被谪被逐，孤苦零丁，他也永不从俗而失节，效忠宗国，乃至生命终止。即便在决定以死警世，他也不忘表白——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，倾诉了不能实现“美政”的理想是他选择自沉的真实原因。即便在他面临死亡，由于“暨志介而不忘”，犹身著奇服，特立独行，勇追前贤。

总而言之，屈原被逐，虽孤独郁闷，却赢得了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时间。亚里士多德说：“幸福存在于闲暇中。”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思想家罗曼·罗兰说：“人生只有一个朋友，而且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有——这就是孤独。”我国安希孟在其《孤独的哲学》里也说：“诗人是苦闷的，哲人是孤独的。苦闷因孤独而生发，孤独借苦闷而增益。”

屈原是一位先知先觉者，既是哲人，又是诗人。当他“美政”宿愿破灭以后，心不甘，志未泯，愤世嫉俗，乃以其完美人格如火山般喷射出他的文学光焰。诚如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所谓：“若人生而具备某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，他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使用这些才华。”哲人不幸诗学幸。终于造就了屈原走向世界文学的巅峰！

屈原沉沦半生，心情抑郁，作品则超凡脱俗。观其品行，思考问题透彻，对情感的体验深刻、有力而持久，但他不愿拘泥于固有的观念，常能以新的想法创造新的作为，注意稳定而难于转移，知识渊藪而话题丰富；观其行事，在政治上，他是社会改革家、“美政”蓝图的执行官；在文学上，他是大胆创新的诗人，由四言诗到七言，而骈文，而赋体。

综观屈原的心理特征，隶属于非精神科范畴的抑郁质，所以不影响他的人格完美和他的文艺成就。相反地，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：“所有在哲学、政治、诗或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人士都具备忧郁的气质。”至于屈原为什么要采取“沉渊”来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，或许是他觉得选择自杀在形式和时间上有相对的自由和随意性，不像比干剖心、伍员挖眼那么突然和苦楚。尽管他很敬重他们，因为他杀毕竟太残忍、太被动。所以，一代伟人，效法彭咸，选择适时自杀，以死明志。这，反映出其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质。